

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

胡 荣

提要:英文文献中有关中国公众对警察的评价的研究在过去 10 多年里不断增多。尽管现有文献有谈及政治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影响,但还没有从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这个角度研究警察信任。基于 CGSS2010 年的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的分析表明,外在效能感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对警察的信任,而内在效能感则显著地减少对警察的信任。尽管公众抗争减少公众对警察的信任,而基层选举的参与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进对警察的信任。

关键词:警察信任 政治参与 内在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

开始于 1980 年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是,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Wu & Sun, 2009)。特别是在近些年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于征地引发的农民维权抗争在各地不断发生,且数量和规模都不断增长(Bernstein & Lu, 2003; Tanner, 2004)。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的重要力量,在稳定压倒一切背景下(汪信砚, 2004),警察常常处于维稳的第一线,要直接面对维权抗争的民众。警察是国家实现管理的重要国家机器,因此民众对警察的信任,也是政治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研究警察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中文文献中,还没有学者对警察信任做过实证研究。而在过去几年里,有关中国民众对警察的评价的英文文献不断增多(Cao & Hou, 2001; Lai et al., 2010; Wu & Sun, 2009, 2010; Sun et al., 2012, 2013)。尽管已有研究也涉及政治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影响(Sun et al., 2012),但至今还没有从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这个角度研究

*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分析方法的改进建议和其他宝贵意见。

警察信任。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不仅在政治行为和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Easton & Dennis, 1967; Hess & Torney, 1967; Hahn, 1998), 而且也对包括警察信任在内的民意研究举足轻重。事实上, 如果公民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既对自己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知识和能力有信心 (内在效能感), 也对政府对自己的诉求做出反应有信心 (外在效能感), 他们可能对政府和警察有更高的信任度。而从政治参与角度研究警察信任, 可以把已有研究忽略的更多方面包括进来 (Sun et al., 2012), 尤其是基层选举对于警察信任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将探讨内外效能感以及各种政治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影响。

根据 2010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项研究将探讨政治效能感 (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 和政治参与的三种形式 (依法抗争、社区参与和基层选举) 对于警察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在梳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接着通过直线回归和广义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影响, 最后对研究的发现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对于政府所具有的影响的信念, 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变迁是可能的以及公民个体能够促使这一变迁发生的感觉” (Campbell et al., 1954: 187)。政治学者在研究政治效能感时通常将其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种。内在效能感指的是个人认为自己拥有影响制度的知识和能力 (Sullivan & Riedel, 2001)。这种效能感通常表明个人参加投票或成为政治活跃者的可能性。外在效能感指的是个人认为政府对其诉求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和程度。外在效能感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个人的需要相关联。较低的外在效能感常常表现为政治冷漠, 公民觉得政府并不代表他们。政治效能感既可以预测选举投票的参与程度, 也可以反映出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以及反体制运动被接受的程度 (Sullivan & Riedel, 2001)。政治效能感较低的选民往往更可能支持改革倾向的候选人, 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去投票,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对政治过程并无太大影响。政治效能感较高者更

可能参加投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对是有影响力的,他们倾向于支持现任者,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已经能够很好地代表他们(Sullivan & Riedel, 2001)。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诸如政治参与(Finkel, 1985, 1987), 政治教育程度(Pasek et al., 2008), 接触媒体的程度(Kenski & Stroud, 2006), 种族、健康状况、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Schur, et al., 2003; Michelson, 2000; Huo, 2005; Kahne & Westheimer, 2002), 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Easton & Dennis, 1967; Hess & Torney, 1967; Hahn, 1998)等。

自195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学者研究了政治效能感、信任以及政治行为的关系。其实,政治效能感与信任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效能感指的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信心的话,那么信任则是对他人(包括制度)的一种信心。信任可以分为政治信任和人际信任两个层面。政治信任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基于政府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民众的正常期待做出反应的基本评价”(Hetherington, 1998:791)。因此,从广义来看,政治信任的对象包括政府机构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人际信任或社会信任指的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承诺是可以依赖的期待”(Rotter, 1967: 651)。信任通常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前者指的是对关系密切的朋友、亲戚和家人的信任,后者指的是对关系较远的一般朋友、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Newton & Zmerli, 2011; Uslaner, 2002)。在以往的研究中,信任被当作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殊信任被看作是一种连结型社会资本,而普遍信任被看作是桥接型社会资本(Brehm & Rahn, 1997; Putnam, 2000)。研究表明,政治信任和人际信任虽然是相关的和相互影响的,但二者从概念上看是可以区分的(Putnam, 2000; Schyns & Koop, 2013; Uslaner, 2002)。有的学者对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Aberbach & Walker, 1970:1204)。当政治效能感低下的时候,公民不信任政府,认为他们的行动很难影响政治领导的作为。相反,当政治效能感较高的时候,公民相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民众考虑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会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对于民主政体的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当代的民主社会,公民应该觉得自己具有影响政府作为的能力”(Wright, 1975: 69)。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在效能感能够明显提升政治信任,而内在效能感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则很弱或不明确(Aberbach & Walker, 1970; Balch,

1974; Catterberg & Moreno, 2006; Cole, 1973; Niemi et al., 1991)。

警察信任是政治信任的一部分,但目前很少研究考察政治效能感对于警察信任的影响。惟一的例外是吴瑜宁和孙懿贤(Wu & Sun, 2009)的研究。他们使用量表测量政治知识、权力和影响力,其中有些问题涉及政治效能感。他们发现中国人具有较高政治效能感者对警察的信任度也较高。本项研究将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探讨这一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探讨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根据以上文献回顾,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1:外在效能感能够增进对警察的信任,即外在效能感越高者,对警察的信任度也越高。

假设2:内在效能感可能减少对警察的信任,即内在效能感越高者,对警察的信任度越低。

(二)中国城乡居民的政治参与

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学者都不认为这些社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如集权模型的学者强调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性控制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通过限制结社自由,政府可以有效地阻止利益的聚合,使人民失去抗拒政治权威的能力(Friedrich et al., 1969:126)。而利益群体理论虽然承认政府并没有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但这一模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决策的可能性。在这些社会中政治的活动和组织(诸如选举、群众运动、工会以及农会等)都是由当局操控的,目的是消除自愿团体的形成,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些社会的民众不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随着一些学者在更广的范围界定政治参与,原有的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将投票看作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和惟一方式)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例如,有学者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诺曼、伏巴,1996:290)。一些学者对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利益以及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如果选举更多的时候因流于形式而成为一种政治仪式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民众将更多地以选举之外

的手段,如个人的接触来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或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偏好。例如,英克尔斯和鲍尔的研究发现“苏联公民更关心获得更多的个人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很少关心获得政治权利和宪法的保障”(Inkles & Bauer,1959:7)。比尔勒的研究表明苏联民众更多参与涉及与公民日常生活、社区事务以及工作单位条件直接相关的决策(Bialer,1980:166)。这些研究发现,在这种社会的民众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独特性,如他们更多是试图影响政策的实施而不是决策过程,参与更多的是以个体、非正式和原子化的方式进行的(参见Jennings,1997)。

就中国的整体制度而言,高层政府官员并未实行直接选举。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虽然也是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通常候选人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确定,而且参与投票的代表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在原有体制中,选举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参与途径。但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的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胡荣,2001;Hu,2005)。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竞争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渠道。虽然与农村的竞争性选举有很大差距,城市社区居委会的成员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而对于城乡居民来说,参与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的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他们与警察接触的机会,尤其是与那些工作在基层派出所的警察的接触机会。通过参与基层选举和社区事务,城乡居民可以增进对警察的接触和了解。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3:参与基层选举和社区事务越多,对警察的信任程度也越高。

如果说基层选举和社区事务的参与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话,城乡居民的维权抗争则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民众的维权抗争以各种形式在各地出现。欧博文用“依法抗争”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农村的维权抗争(O'Brien,1996),当农民面对腐败、环境污染、乱收费、征地拆迁等问题时,就会诉诸抗争维护他们的利益。依法抗争是一种部分制度化的大众抗争形式,受冤屈的民众在与国家的抗争中通过运用国家法律、政策和官方话语来使自己的诉求合法化(O'Brien,1996)。依法抗争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直接挑战统治合法性的大众抗争。依法抗争者接受国家法律、政策和核心价值的合

法性,只是当他们认为当政者未能践行承诺或者违背了法律和广泛认可的价值观时才进行抗争(O'Brien, 1996; O'Brien & Li, 2006)。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中国公民开始利用行政的(上访)和法律的渠道来解决问题和让地方当局负责。

尽管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尤其是上访和抗争,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研究。就像人们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会影响他们对警察的看法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由于依法抗争者的抗争行动与处于维稳第一线的警察的工作是相对立的,我们提出:

假设4:参与依法抗争越多,对警察的信任程度越低。

二、数据和变量测量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进行,最初两年一次,现在是每年一次。2010年CGSS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遍及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计划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计划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约12000人。其中,在抽取初级抽样单元(县区)和二级抽样单元(村委会和居委会)时,利用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纸上作业;而在村委会和居委会中抽取要调查的家庭时,则采用地图法进行实地抽样;在家庭中调查个人时,利用KISH表进行实地抽样。

(一)因变量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取自问卷中的问题:你多大程度上信任警察?答案分别为:(1)完全不可信;(2)比较不可信;

(3)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4)比较可信;(5)完全可信。

表 1 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完全不可信	311	2.66
比较不可信	861	7.35
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1892	16.15
比较可信	4823	41.18
完全可信	3825	32.66
合计	11712	100.00

(二) 预测变量

主要预测变量分为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两类。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两个指标,外在效能感因子和内在效能感因子,通过对问卷中如下 5 个项目的因子分析获得:(1)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2)如果让我当政府干部,我也能完全胜任;(3)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4)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5)我对政府部门的意见/建议可以有办法让领导知道。问题的答案分为:(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无所谓,(4)同意,以及(5)完全同意。这 5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74,表明其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我们用主成份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外在效能感因子”和“内在效能感因子”。外在效能感因子包括 3、4、5 三个项目(因子负荷分别为 0.81,0.80,和 0.72;特征值为 1.84;解释方差 36.89%),内在效能感因子包括 1、2 两个项目(因子负荷分别 0.90 和 0.91;特征值为 1.70;解释方差达 34.01%)。

我们用如下三个变量测量政治参与。首先,在问卷中用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与过如下 7 项活动:(1)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的工作;(2)向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提建议或意见;(3)参加集体上访;(4)参加写联名信;(5)向新闻媒体反映有关小区的问题;(6)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有关小区的问题;(7)参加抗议或请愿。答案分为“参与”(1)和“没有参与”(0)两种。这 7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高达 0.922,表明这些项目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依法抗争因子”

和“社区参与因子”。“依法抗争因子”包括前述第3、4、5、7等四个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76,0.72,0.42和0.71,特征值为1.99,解释方差28.36%);“社区参与因子”包括第1、2、6等三个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79,0.81和0.47,特征值为1.58,解释方差为22.63%)。

测量政治参与的第三个变量是基层选举参与,用的是问卷中这样一个问题:“在上一次村委会/居委会选举中是否参与投票?”回答分“参与”(1)和“未参与”(0)两种。

(三)控制变量

本项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背景特征的一些变量和社会信任。年龄是定距变量。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小学及以下=1,中学=2,高中=3,大专=4,本科及以上=5。性别(男=1)、户口(农村户口为“1”,城市户口为“0”)、是否党员(党员=1)、是否汉族(汉族=1,非汉族=0)、宗教信仰(信教=1,不信教=0)等都是虚拟变量。阶层流动这一变量来自受访者现在所认同的阶层与10年前认同的阶层的比较:“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下面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图。‘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我们分别问受访者10年前自己处于什么等级,现在又处于什么等级,用现在所处的等级减去10年前所处的等级即获得阶层流动这一变量。社会公平感是这样测量的,我们问受访者总体上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公平,答案分为“完全不公平”、“比较公平”、“居中”、“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5种,分别赋值“1”至“5”。

社会信任的两个因子,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来自对8个测量社会信任的问题的因子分析。我们要求受访者回答对8种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自己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事、领导干部、生意人、同学、老乡,答案分别为“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不可信和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5种,依次分别赋值“1”至“5”。这8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达0.808,表明这些项目具有较高的信度。用主成分法对这8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包括对朋友、同事、领导干部、生意人、同学、老乡的信任(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57、0.72、0.71、0.69、0.68和0.72,特征值为2.915,解释方差为36.44%),特殊信任因子包括对自家人和亲戚的信任(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81和0.75,特征值

1.731,解释方差为21.63%)。

表2呈现的是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为了排除各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对所有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只有户口和教育程度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0.501),在可接受范围。

表2 回归分析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Mean	SD	Min	Max	n
因变量					
警察信任	3.94	1.01	1	5	11712
自变量					
外在效能感	0	1	-2.31	2.89	11403
内在效能感	0	1	-1.91	2.61	11403
依法抗争	0	1	-.74	15.17	11662
社区参与	0	1	-3.10	5.91	11662
基层选举	.48	.50	0	1	11166
控制变量					
性别	.48	.50	0	1	11783
年龄	47.31	15.69	17	96	11779
教育程度	2.22	1.23	1	5	11777
户口	.51	.50	0	1	11781
是否信教	.13	.34	0	1	11752
是否汉族	.91	.29	0	1	11761
社会流动	.68	1.64	-9	9	11716
社会公平感	2.99	1.09	1	5	11754
普遍信任	0	1	-4.05	4.20	10952
特殊信任	0	1	-8.10	2.08	10952

三、研究发现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警察信任是定序变量。目前比较多的做法是把定序变量当作定类或定距变量处理,前者将测量结果简化为定类变量,会丢失一些信息,而后者则不够严谨。更为流行的做法是建立定序逻辑

辑斯蒂回归,但其前提是平行线检验不显著,本项研究的相关数据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General Ordered Logit Model)进行分析,同时辅助参考直线回归模型。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Gologit)模型可以表示为:

$$P(Y_i > j) = g(X_i\beta_j) = \frac{\exp(\alpha_j + X_i\beta_j)}{1 + [\exp(\alpha_j + X_i\beta_j)]}$$

$$j = 1, 2, \dots, M - 1$$

其中 M 是定序变量的类别数。在本项研究中, M = 5, 当 j = 1 时, 类别 1 与类别 2、3、4、5 比较; 当 j = 2 时, 类别 1、2 与类别 3、4、5 比较; 当 j = 3 时, 类别 1、2、3 与类别 4、5 比较; 当 j = 4 时, 类别 1、2、3、4 与类别 5 比较。

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警察信任这一定序变量作为因变量建立的 OLS 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显示,除性别、是否信教这两个变量外,其他所有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地说,年龄的增长可以增加对警察的信任,教育程度的提高减少了对警察的信任,农村户口的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高于城市户口,汉族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低于少数民族的受访者,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都可以提升人们对警察的信任,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公平感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对警察的信任。而作为本项研究主要预测变量的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对影响警察信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对警察的信任,而后者则减少对警察的信任。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是一致的。政治参与的三个指标中,社区参与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依法抗争和基层选举参与都对因变量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前者减少对警察的信任,后者增进对警察的信任。而户口与基层选举的交互作用项表明,城市社区基层选举的参与比农村村委会选举的参与更能增进对警察的信任。

表 3 影响警察信任的因素:OLS 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			
性别(男=1)	-.029	.018	.104

续表 3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年龄	. 003	. 001	. 000
教育程度	-. 050	. 009	. 000
户口(农村户口 = 1)	. 168	. 029	. 000
是否信教(信教 = 1)	. 047	. 028	. 092
是否汉族(汉族 = 1)	-. 129	. 033	. 000
普遍信任	. 207	. 009	. 000
特殊信任	. 105	. 009	. 000
社会流动	. 016	. 006	. 004
社会公平感	. 176	. 009	. 000
预测变量			
政治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	. 146	. 009	. 000
内在效能感	-. 084	. 010	. 000
政治参与			
依法抗争	-. 031	. 009	. 001
社区参与	-. 017	. 009	. 063
基层选举	. 125	. 027	. 000
户口 × 基层选举	-. 108	. 037	. 003
常数	3. 321	. 065	. 000
N	9985		
Adjust R ²	. 2087		

我们再来看一看广义定序逻辑斯蒂(Gologit)回归模型的结果。如前所述,用直线回归模型或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处理定序变量存在不严谨的问题。通过建立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可以精准地预测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对因变量在哪一个选项上会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了能更直观地看出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在表中呈现的是优势比(odds ratio)。与前面的直线回归模型一致,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因变量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年龄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在第一组(“完全不可信 vs 其他”)和第二组(“完全不可信 + 比较不可信 vs 其他”)的比较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只在第三组和第四组的比较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警察的信任有增加(优势比大于1)。教育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方向相反(优势比小

于1),即在第一组(“完全不可信 vs 其他”)和第二组(“完全不可信 + 比较不可信 vs 其他”)的比较中,教育程度的影响并没有显著性,只是到了第三组和第四组的比较中,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对警察的信任。农村户口的受访者对于警察的信任总体上高于城市户口的受访者,但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比较中,这种差异不具有显著性,只是在第三组和第四组,农村居民对警察的信任才会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也就是说,在第三组的比较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选择“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的可能性,相对于选择前三项(“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和“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可能性,高出42.8%。宗教信仰对因变量有一定影响,总体看是信教者的警察信任高于不信教者,但具体不同组别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是不同的。是否汉族对因变量影响的优势比小于1,因此总体看汉族对警察的信任低于少数民族,但只在第三组、第四组中才有统计显著性。普遍信任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而特殊信任也能促进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虽然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逊于前者。向上社会流动对于警察信任只有微弱的影响,而社会公平感则能在较大程度提升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

表4 影响警察信任的因素: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Gologit)

	第一组 1 vs 2-5	第二组 1-2 vs 3-5	第三组 1-3 vs 4-5	第四组 1-4 vs 5
控制变量				
性别(男=1)	.834	.910	.918	1.021
年龄	1.001	1.004	1.005 **	1.011 ***
教育程度	.978	.953	.893 ***	.826 ***
户口(农村户口=1)	1.207	1.219	1.428 ***	1.459 ***
是否信教(信教=1)	1.611 **	1.079	1.252 **	.911
是否汉族(汉族=1)	.651	.809	.686 ***	.732 ***
普遍信任	1.912 ***	1.848 ***	1.779 ***	1.399 ***
特殊信任	.993	1.120 ***	1.269 ***	1.525 ***
社会流动	1.036	1.033	1.054 ***	1.014
社会公平感	2.099 ***	1.599 ***	1.452 ***	1.357 ***
预测变量				
政治效能感				
外在效能感	1.506 ***	1.512 ***	1.407 ***	1.351 ***
内在效能感	.764 ***	.853 ***	.873 ***	.828 ***

续表 4

	第一组 1 vs 2 - 5	第二组 1 - 2 vs 3 - 5	第三组 1 - 3 vs 4 - 5	第四组 1 - 4 vs 5
政治参与				
依法抗争	. 926 *	. 932 **	. 948 *	. 996
社区参与	. 896 *	. 915 **	. 991	. 996
基层选举	1. 431 *	1. 233 *	1. 290 ***	1. 272 ***
户口 × 基层选举	. 910	. 895	. 801 *	. 796 *
N	9985			
Log likelihood	- 11735. 937			
Pseudo R ²	. 1062			

注:(1)表内所列的是优势比(odd ratio)。(2)*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1 = 完全不可信; 2 = 比较不可信; 3 = 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 4 = 比较可信; 5 = 非常可信。

进一步分析广义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几个主要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我们可以有如下发现。

首先,外在效能感能够显著提升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外在效能感这一预测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都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各组的优势比都大于 1,说明受访者的外在效能感越强,他对警察信任程度也越高。具体地说,在第一组选项的比较中,如果外在效能感增加 1 个单位,受访者选择“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可能性增加 50.6%;在第二组的比较中,如果外在效能感增加 1 个单位,选择“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的可能性增加了 51.2%;在第三组中,外在效能感增加 1 个单位,选择“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可能性增加了 40.7%;在第四组中,外在效能感增加 1 个单位,选择“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的可能性增加了 35.1%。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其次,内在效能感能够显著减弱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内在效能感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有统计显著性,而且表中各组的优势比均小于 1,表明内在效能感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受访者内在效能感越

强,对警察的信任度越低。具体地说,在第一组选项的比较中,如果内在效能感增加1个单位,受访者选择“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23.6%(即0.764减1,下同);在第二组的比较中,如果内在效能感增加1个单位,选择“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14.7%;在第三组中,内在效能感增加1个单位,选择“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可能性减少了12.7%;在第四组中,内在效能感增加1个单位,选择“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17.2%。因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

第三,依法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具体地说,在第一组选项的比较中,如果依法抗争增加1个单位,受访者选择“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可能性减少7.4%;在第二组的比较中,如果依法抗争增加1个单位,选择“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6.8%;在第三组中,依法抗争增加1个单位,选择“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可能性减少了5.2%;在第四组中,依法抗争增加1个单位,选择“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4%。前3组的优势比都有统计显著性,只是最后一组没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

第四,社区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警察的信任。具体地说,在第一组选项的比较中,如果社区参与增加1个单位,受访者选择“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可能性减少10.4%;在第二组的比较中,如果社区参与增加1个单位,选择“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8.5%;在第三组中,社区参与增加1个单位,选择“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可能性减少了9%;在第四组中,社区参与增加1个单位,选择“完全可

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的可能性减少了4%。前面两组的优势比都有统计显著性,后面两组没有统计显著性,但社区参与对因变量的影响还是比较清晰的,即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对警察信任度降低。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

第五,参与基层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进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基层选举对于警察信任的影响的四组优势比均大于1,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基层选举对于警察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具体地说,在第一组选项的比较中,如果基层选举增加1个单位,受访者选择“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可能性增加43.1%;在第二组的比较中,如果基层选举增加1个单位,选择“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的可能性增加了23.3%;在第三组中,基层选举增加1个单位,选择“比较可信”+“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可能性增加了29%;在第四组中,基层选举增加1个单位,选择“完全可信”比选择“完全不可信”+“较不可信”+“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的可能性增加了27.2%。户口和基层选举的相互作用项(“户口*基层选举”),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只有在后两组有微弱的统计显著性,因为四组的优势比均小于1,可以断定这一相互作用项对因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表明基层选举对于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影响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即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四、讨论与结论

基于CGSS 2010年的数据,本文在控制了受访者的人口学变量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后,探讨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对于中国城乡居民警察信任的影响。我们假定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和更高程度的社区事务以及基层选举的参与能够增进对警察的信任,而依法抗争的参与则可能减少对警察的信任。我们的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与警察信任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我们的发现在很大

程度上与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

首先,我们发现外在效能感能够增进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如果受访者觉得他们在让政府对其诉求做出回应方面是有影响力的话,他们往往对警察持正面积极的看法。国外已有研究发现,外在效能感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 Catterberg & Moreno, 2006; Niemi et al., 1991),这与我们的研究是一致的。有学者在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能够促进村民对现任村干部和自治系统的正面看法(Chen, 2005),我们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high power distance society)(Hofstede, 2001),但是外在效能感对政治信任有正面影响这一发现也适合中国的城乡居民。

我们的发现也表明,内在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也对城乡居民的警察信任产生影响。如果考虑到以往文献中发现的在内在效能感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例如 Morrell, 2003),那对本项研究中的内在效能感与警察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一发现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而且,尽管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反应能够增进后者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但是,对自己能力更有自信的受访者对政府机构的期待也可能更高,因此更可能产生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情感,并因此导致对警察的信任下降。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内在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这种负向关系。

其次,我们发现依法抗争和基层选举这两种政治参与方式对警察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基层选举与警察信任的这种显著相关可以看作是基层选举的参与在民众中产生一种赋权效应,民众通过参与基层选举而对基层社区事务有了更大的发言权。那为什么城市基层选举的促进作用更大于农村呢?城市的社区居委会与农村的村委会虽然都是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但后者的重要性远超前者,而且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村级选举搞得轰轰烈烈,其竞争激烈程度远高于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虽然城乡基层选举的参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一种亲建制(pro-establishment)的行为,但农村的选举因具有竞争性而使其更可能包容一些具有反建制倾向的村民的参与,因而其对村民警察信任的增加幅度自然要小于城市选举对城市居民的影响。

与基层选举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增进作用不同,依法抗争更可能导致对警察的不满。通常情况下依法抗争者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

诉诸抗争。这些人可能因为遭受了不公待遇而对政府机构抱有负面的态度。此外,尽管公众的抗争有多种形式,而且大多数抗争都是制度化的和和平的,参与抗争往往会提升与政府和警察的紧张关系,甚至达到暴力对抗的程度,从而导致对体制的负面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表明,社区事务的参与并未能提升受访者的警察信任。虽然较多参与社区事务就会有较多的机会与警察打交道,但这并不能提升警察信任。社区事务参与对警察信任的影响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我们发现受访者一些重要的身份地位指标对警察信任有重要影响。分析表明,性别、是否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以及户口等都与警察信任相联系,即男性的警察信任低于女性,汉族低于少数民族,年轻人低于老年人,受教育程度高者低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城市居民低于农村居民。通常情况下是弱势群体更多地表现为对体制的不满和不信任,但上述这些群体,即男性、汉族、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城市居民决非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改革开放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使得这些群体对政府的期待不断提升,对政府的不满也日益增多,对政府的信任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与西方民主国家 1990 年代以来的“批判性公民”现象非常类似(Norris, 1999)。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这些群体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发现公众对警察的信任是与他们的社会信任及公正感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察信任可以被看作是包括更广的相互关联的社会态度的一部分。对某一方面制度的正面评价会影响另一方面的评价。在本项研究中,较高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度也较高,越是认为社会公正的受访者对警察的信任也越高。未来的警察信任研究应该继续考虑纳入这些态度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使用的是二手的调查数据,本项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本项研究缺少以往研究中被证明有效的几个预测变量。例如,近期的研究表明,表现性关注(例如,邻里的凝聚力和生活质量)和工具性关注(例如,对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担心)是中国人对警察信任的有效预测变量(例如,Sun et al., 2013a, 2013b)。同样,个人与警察接触的经验也会影响对警察的评价(Lundman & Kaufman, 2003; Weitzer & Tuch, 2002)。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警察信任,未来的研究应该把这几个自变量作为预测变量考虑进来。

其次,我们在本项研究中只使用一个单一的项目测量警察信任。尽管这一做法在以往的文献中并不少见,而且也得到了最近有关中国人的警察信任是单一维度的这一发现的支持(Sun et al., 2013a, 2013b),但单一指标的测量容易导致把社会现象简单化甚至造成误解(Hudson & Kuhner, 2010)。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从不同的方面,诸如基于程序的信任和基于结果的信任(Tyler & Huo, 2002),使用综合的和较为全面的指标,来测量中国人的警察信任。

第三,由于本项研究是一次横剖研究,即在单一时点对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无法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在回归模型中基层选举、依法抗争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但严格说并不能就此说明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只能说前者与后者统计上相关。要解决这一问题,尚待以后通过多时点收集数据的纵贯研究。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政策意义上有两点启示。一方面,毫无疑问,警察信任是政治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百姓对政治制度信任的重要指标。我们发现诸如较高的外在效能感、参与基层选举和较高的社会信任感和公正感,这些亲建制的活动,能够增进公众对警察的信任。政府应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让民众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反建制的活动,尤其是依法抗争,会导致对警察信任的流失。因此,中国现有的信访制度可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以建立更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和维权机制。公众的不满如果不加以疏导的话,有可能升级为广泛的挑战现有体制的激进活动。因此,政治改革虽然不一定保证能增进政治信任,但是却可以很大程度上增进政府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 胡荣,2001,《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个案研究》,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诺曼,尼·西德尼·伏巴,1996,《政治参与》,格林斯坦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竺乾威、储复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汪信砚,2004,《邓小平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 Aberbach, Joel D. & Jack L. Walker 1970, "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 Balch, G. 1974, "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esearch: The Concept 'Sense of Political

-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2).
- Bernstein, T. & X. Lu 2003,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aler, Seweryn 1980,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an, Yi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Brehm, J. & W. Rahn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 Campbell, A., Gurin, G. & W.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 Cao, L. & C. Hou 2001, "A Comparison of Confidence in the Polic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9.
- Catterberg, G. & A. Moreno 2006, "The Individual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Trends in New and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1).
- Chen, J. 2005, "Popular Support fo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China: Intensity and Sources." *Asian Survey* 45(6).
- Cole, R. 1973, "Toward a Model of Political Trust: A Caus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7(4).
- Craig, S., R. G. Niemi & G. E. Silver 1990,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 A Report on the NES Pilot Study Items." *Political Behavior* 12(3).
- Easton, D. & J. Dennis 1967,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1).
- Finkel, Steven E. 1985. "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4).
- 1987,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a West German Pan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9(2).
- Friedrich, C., M. Curtis & B. Barber 1969,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Praeger.
- Hahn, C. 1998, *Becoming Politic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ess, R. D. & J. V. Torney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ldren*.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 Hetherington, Marc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u, Rong 200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4).
- Hudson, J. & S. Kuhner 2010, "Beyo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 The Methodological

- Challenges of Capturing the Productive and Protect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9(2).
- Huo, J. 2005, “Political Efficacy in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Taiwan: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ffect Political Efficacy.”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Inkles, Alex & Raymond A. Bauer 1959,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ent 199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2).
- Kahne, J. & J. Westheimer 2002, “The Limits of Efficacy: Educating Citizen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 Kenski, Kate & N. J. Stroud 2006,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50(2).
- Lai, Y., Cao, L. & J. Zhao 2010,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Entity on Confidence in Legal Authori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
- Lundman, R. & R. Kaufman 2003, “Driving While Black: Effects of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on Citizen Self-reports of Traffic Stops and Police Actions.” *Criminology* 41(1).
- Michelson, M. R. 2000, “Political Efficacy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of Chicago Latino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1(1).
- Morrell, M. E. 2003,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7.
- Newton, K. & S. Zmerli 2011, “Three Forms of Trust and Their Association.”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
- Niemi, R. G., S. C. Craig & F. Mattei 1991, “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 Norris, P.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Kevin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
- O'Brien, Kevin & Lianjiang Li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sek, J., L. Feldman, D. Romer & H. Jamieson 2008, “Schools as Incubator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Building Long-Term Political Efficacy with Civic Education.”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2(1).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ead, Benjamin L. 2000,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Nerve Tips’.”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 Rotter, J. 1967,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5(4).

- Schur, L., T. Shields & K. Schriener 2003, "Can I Make a Difference? Efficacy, Employment, and Disabil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24(1).
- Schyns, P. & C. Koop 2013, "Political Dis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in Europe and the US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6(1).
- Skilling, G. H. 1983,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36(1).
- Skilling, Gordon H. & Franklyn Griffiths (eds.) 1971,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llivan J. L. & E. Riedel 2001, "Efficacy: Political."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Ltd.
- Sun, Ivan, Rong Hu & Yuning Wu 2012,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Trust in Police in Urban Chin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5.
- Sun, I., R. Hu, D. Wong, X. He & J. Li 2013a, "One Country, Three Populations: Trust in Police among Migrants, Villagers, and Urbanite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6).
- Sun, I., Y. Wu & R. Hu 2013b, "Public Assessments of the Police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3(4).
- Tanner, M. 2004,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7(3).
- Tyler, T. & Y. Huo 2002, *Trust in the Law: Encouraging Public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Court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Uslaner, E.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 Jae-on Kim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der, Andrew 1991,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ng, Y., N. Rees & B. Andreosso-O'Callaghan 2004, "Economic Chang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39).
- Weitzer, R. & S. Tuch 2002, "Perceptions of Racial Profiling: Race, Clas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Criminology* 40(2).
- Wright, James D. 1975, "Does Acquiescence Bias the 'Index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9(2).
- Wu, Yuning & Ivan Sun 2009, "Citizen Trust in Police: The Case of China." *Police Quarterly* 12.
- 2010, "Perceptions of Poli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33.
- Wu, Yuning 2010,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s of Police Performance: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闻翔